

吳振漢 著

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吳振漢著

文史哲學集成

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 / 吳振漢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81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271)
ISBN 957-547-183-0(平裝)

1. 國民政府

628 35

81006172

②71 成集學哲史文

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

著者：吳振漢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二六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183-0

自序

一九八八年上半年，我的有關明清社會史的博士論文已大致完成，靜候老師們的批改。閒暇之餘，便在普大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葛思德圖書館 (The Gest Library) 中，搜尋國民政府時期要人回憶錄和《文史資料》裏相關論文閱讀解悶。最初只當這些讀物爲閒書消遣，但不久便至入迷的程度，乃至對這段被國、共兩邊官方傳媒扭曲甚烈的歷史，興起探索其史實真相的雄心。因此，相當偶然的，我竟在這個以明清史料收藏豐富著稱的圖書館中，開始對國民政府時期史產生濃厚的興趣。

民國七十七年秋，返國任教於中央大學。由於適值解嚴之初，社會動象叢生，學生們對黨國難分、威權領導、媒體管制等戒嚴時期的餘緒，有著問不完的問題，因而更激發我追索國民政府時期政治思想史的興趣。民國七十八年初，便開始著手本書寫作的計劃，在國科會、中大文學院、共同科的經費支助下，我得以收購閱覽大批相關史料，並展開口述歷史訪問活動以與文獻資料相應證。回顧過往的四年中，除教學以外，所有學術精力幾乎盡耗於斯，如今書成出版，總算在國民政府時期史的研究

1/11/15

上踏出第一步。

本書的完成，首先得感謝國科會、國史館、中大等單位在經費和設備上的協助。其次同事先進陳飛龍、張勝彥、段昌國三位先生的提攜和鼓勵，也令我銘感在心。另外還要謝謝程克雅、林建勳、丁亞傑、李玉珍、張源泉諸位研究所同學，在過去四年中，先後擔任我的研究計劃助理，奔波任事，毫無怨言。

吳振漢誌於中央大學文學院三二一研究室

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 目次

自序	一
導論	一
第一章 辛亥革命以來山西人士的保守意識	五
前言	五
第一節 辛亥革命爆發前的山西	六
第二節 閉關自守時期（民國元年至十五年）	一〇
第三節 出擊與受挫（民國十六年至十九年）	二〇
第四節 保守圖存時期（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八年）	三一
一、抗戰之前	三二
二、抗戰期間	三九
三、抗戰之後	五〇

小結	五六
----	----

第二章 國民革命以來廣東人士的正統意識	七一
---------------------	----

前言	七一
----	----

第一節 廣東人士正統意識的形成（民國十四年以前）	七二
--------------------------	----

第二節 國民革命的發展與正統危機的產生（民國十五年至二十一年）	八一
---------------------------------	----

第三節 另創正統的嚐試與失敗（民國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	九八
-----------------------------	----

一、廣東的「西南政務委員會」	九八
----------------	----

二、福建的「人民政府」	一〇三
-------------	-----

三、抗戰期間汪兆銘的「還都」	一〇八
----------------	-----

第四節 廣東團體的終結（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	一二
--------------------------	----

小結	一五
----	----

第三章 北伐以來廣西人士的疏離意識	一二七
-------------------	-----

前言	一二七
----	-----

第一節 北伐前的廣西	一二八
------------	-----

第二節 從北伐到抗戰的分合	一三八
---------------	-----

第三節 抗戰期間的再度合作	一五四
---------------	-----

第四節 抗戰勝利後的決裂·····	一六九
小 結·····	一八〇
第四章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一九七
前 言·····	一九七
第一節 近代東北本土意識的形成·····	一九八
第二節 第一次流亡（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四年）·····	二〇五
一、「九一八事變」至熱河失陷（民國二十年九月至二十二年三月）·····	二〇七
二、熱河失陷至「二二事件」（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至二十六年二月）·····	二一三
三、「二二事件」至抗戰勝利（民國二十六年二月至三十四年八月）·····	二二五
第三節 勝利接收與第二次流亡（民國三十四年——）·····	二三一
一、民國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六月·····	二三二
二、民國三十五年七月至三十七年十月·····	二三六
三、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	二四二
小 結·····	二四五
結 論·····	二六三
徵引書目·····	二六七

導論

所謂「國民政府時期」，有數種不同的涵意，（註一），本書中所指的時段，是從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至民國三十七年中華民國行憲政府成立為止。然歷史研究無法不追溯前因、探究後果，所以本書探討範圍雖以國民政府時期為主，但為研究需要，有時向前後延伸至辛亥革命和國共交替兩時期。國民政府是一個由中國國民黨建立、指導，並代其推行黨綱的機構，所以國民黨軍、訓政時期的國家統一、安內攘外等主張，也就成了國民政府施政的要務。國民政府很成功的清除了北洋勢力，但對部分有顯著省籍情結的地方派系，卻始終難以徹底統合。

本書所論之地方派系，即指這些有省籍情結的地方團體。惟此類團體為數不少，且彼此頗有差異，因此必須嚴定取捨標準，以便深入探討。是以本研究所定標準是：超省界的組合，如馮玉祥所領導的一西北軍一系統；一省之內有若干小團體，如四川的劉湘、劉文輝、楊森等；以及雖是省籍團體，但與國府中央互動關係不甚密切者，如雲、貴等省份，皆不在討論範圍之內。所餘大致便只有山西、廣東、廣西、東北四個地方團體而已（東北地區在行政區劃上雖為三省，但人文、地理上直可視同一

個省區）。而這四個地方派系團體形成的因素非止於一，為研究效率，本書將集中對造成該四區地方情結的主導意識加以深究，以期借此對瞭解國民政府時期複雜的中央與地方互動關係，提供一條有力的線索。

本研究的史料基礎，大致可為文獻和口述訪問兩部分。文獻資料方面，除參考有關中國現代史的一些重要期刊、回憶錄、報紙外，尤其從大陸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和各省、市《文史資料》裡，徵引了大量史料。因解嚴前的思想管制措施，以往台灣史學界對這套史料引用較少；而大陸學界雖早已大量使用，但受意識型態限制甚大頗影響到取材和立論。這套史料實是治國民政府時期地方派系史的一大寶藏，即以本研究最關注的山西、廣東、廣西、東北四地區而言，除《文史資料選輯》中部分相關資料外，四個區域當地的《文史資料》也共累積約五百輯，數量不可謂之不龐大。而質的方面也甚佳，大多記載都是當事者的回憶（甚至可說是一種坦白供狀），且因受中共官方修史的壓力，這些作者多無一般回憶錄當事人那般自矜己功、歸罪於人的通病。經我們將這批史料徵信於口述歷史受訪者，證實《文史資料》中，除受迫對中共歌功頌德和惡意詆毀國民黨執政人士部分外，大致均是記實。甚至有一位廣西籍資深國大代表以親身為例告訴我們，《廣西文史資料》內某篇記述他當年縣長任內施政的文章，可信度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見這套史料的價值甚高。至於那些蓄意溢美和惡意毀謗的不實部分，相信凡瞭解歷史背景，同時受過嚴格史學訓練的學者，都可輕易分辨出來。

至於口述歷史部分，本研究進行過程中，訪問了近五十位上述四地區的人士，其中絕大多數均為

民國三十七年行憲之初，選出的中央級民意代表。我們很慶幸能在他們退休前後的二、三年中留下這批寶貴的歷史證辭。惟其中部分立委、國代不願我們直接徵引他們的說辭，甚至為政治顧慮，不願讓他們名字見諸文字。因此儘管我們大多做有錄音存證和書面記錄，但為尊重受訪者的意願，本書並未明確徵引這批口述資料。不過，在協助驗證文獻記載真實性、提供珍貴史料、以及思路啓發等方面，受訪者們對本書的寫成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國、共兩黨都十分強調民族主義、中央集權等主張，所以無論是台灣或大陸，在兩個意識型態強烈的政權主導下，以往現代史的研究，在處理中央與地方互動關係時，大都重中央而輕地方。本研究則試圖從地方的角度，重新檢視這個問題。至於西方對中國現代史中地方派系的研究，近年雖有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Donald G. Gillin,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等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這些著作的重點在於建立一套理論，來詮釋地方派系活動，及其與中央關係，與本書從具體的史料和史實著手，經由對地方意識的探討，來說明地方與中央的互動關係，在研究取向上有相當大的差異。不過，本書為集中個人有限的精力和識見，故只能各挑選一種主導地方意識，做為探討地方派系的主軸，在分析上自難周全，這是以後尚待繼續努力、加强的地方。

本書基本上是由四個國科會補助的研究計劃成果構成，其進行次序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七十八年度）、「北伐以來廣西人士的疏離意識」（七十九年度）、「辛亥革命以來

山西人士的保守意識」(八十年度)、一國民革命以來廣東人士的正統意識」(八十一年度)。但在整理成書時，則以每一主題的開始年代前後次序重新排列如現狀，在此特加說明，以利讀者瞭解本書作者在中國現代史研究方面的學習和摸索過程。

【附註】

註一：荆知仁，《中國立憲史》（聯經出版社，台北，一九八四），頁三五二。

第一章 辛亥革命以來山西人士的保守意識

前言

山西地形封閉，素有「表裡山河」之稱，再以境內農產不豐，人民生活貧困，實已爲保守意識的產生提供了充分條件。惟在明、清帝國全盛時期，科舉配額、任官避諱本籍等制度維繫下，出入山西的士人、官吏，流通了新的思想，也更加強了該省人士與其他地區的溝通。尤其是那些在明、清時代叱咤風雲、縱橫全國的山西商人，（註一）他們帶回家鄉的不僅是財富，更有許多新的資訊、觀念，以及勇於冒險和勤於創新的精神。上述的帝國制度和商人精神，在清末以前足以突破大自然對山西的封鎖，但在辛亥革命前後，這些反制保守意識的人文因素逐漸衰微，近代山西人士的保守意識由是發端。

本文所論之保守意識大致可分三個層次：其一，因無知、恐懼、或受宣傳洗腦，而非理性的排斥一切變革；其二，因恐失去既得利益，而反對所有改變現狀之舉；其三，因出於對傳統文化、制度、價值的認同和珍惜，而不能接受任何全然不顧歷史傳統的革命。以上三種保守意識，除第一和第三種

可能互斥外，其他如第一、第二種及第二、第三種，基本上均可能並存於一人身上。事實上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我們確也發現部分山西人士的保守行爲，是基於一種以上的保守意識。

第一節 辛亥革命爆發前的山西

二十世紀是山西商人衰微的時代。自義和團拳亂、八國聯軍入侵之後，兵連禍結，民不聊生，素以中、長程貿易爲主的山西商人，頓失治安保護和市場，生意遂一落千丈。一向以出大商人著名的太谷縣，其民國刊本的地方志中即云：

商務自清季已形彫敝。改革以來，凡外埠設有分莊者，因直接、間接之損失，或則縮小範圍，或竟停止營業，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數年來，各省兵禍相尋無已，在外經商因失業而賦閒者，所在皆是。來源頓竭，生計固難，此閭閻之所以日見貧乏也。（註二）

「來源頓竭」的，可能尙不止是財富，同時應也是新的思想、資訊和山西商人的活力。毗鄰陝西，一向以陝西省爲發展空間的臨晉商人，也遭遇類似的困境：

民國紀元前，臨民經商陝西省者，常萬餘人。凡子弟成年，除家無餘丁及質地魯鈍者外，悉遣赴陝西習商。陝省金融業歸臨人掌握者居其泰半，其他各貿易所，亦多臨人據其要津。……民國肇建，陝省亂機四伏，盜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賈因之裹足。臨民之操奇計贏者

，生理日形頹敗，率多歸里。資財之輸入既歲減萬金，物品之銷耗又日增數千人，臨民生計之艱苦，勢所必至。（註三）

這批「歸里」的山西菁英，非但增加家鄉的經濟、社會問題，也無從再發揮其冒險、進取的潛力。

一些個別的山西富商家族的遭遇，更深刻的說明了這種衰落的趨勢。例如在清代以從事中、俄貿易而發達的榆次常氏家族，除在其發跡的張家口、恰克圖擁有眾多鋪面外，分店廣設於「遼、瀋、京、津，暨吳之蘇淞、荆之漢沔」等處，乃至俄都莫斯科，亦設有分店。但「常家商業衰落，起於庚子之役。辛亥革命後的民國二年，即一蹶不起，基本倒閉」。其衰落原因除俄商拖欠巨款，及辛亥革命後收不回貸予前清官吏之款項外，常家在清末所經營的「帳局、票莊呈現出一定的局限性，逐步為新起的銀行所代替」，（註四）亦是要因。可見縱橫明、清帝國的山西商人，清季以降，因地理位置所限，其傳統經營技術，與外商或廣東、江浙商人相較，已顯落後。（註五）

另如在乾隆、嘉慶年間已在包頭創業的祁縣喬家，民國三年其主要負責人喬映霞，便在袁世凱所派之巡按使金永的逼迫下，離開家鄉逃往天津。民國十五年，馮玉祥所部國民軍敗退至綏遠，餉糧攤派極重，喬家復字號受創甚重，從而中衰。（註六）由以上例證可知，山西商人因受清末民初戰亂頻仍、政治黑暗，以及傳統商業經營技術局限性的影響，自二十世紀之初，便已步入衰運。這山西開放進取精神表徵的衰微過程，正是保守意識興起的重要背景。

二十世紀的開始，對山西學術界而言，也是一轉捩點。十九世紀末葉，山西最高學府為晉陽書院

和令德堂，也是全省學術的核心。戊戌變法前，該二書院所授課程大致不出經史、考據、詞章等傳統國學，受變法影響後，才添設「政治時務、農功物產、地理兵事、天算博藝」（註七）等新學。義和團運動後，英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與山西巡撫岑春煊達成協議，以教案賠款一百萬兩的一半，做為辦學之資，設立山西大學堂。該大學堂創立於一九〇二年，在全國各省興辦新式大學時間排行中，名列前茅。然入學學生「都是通過學台向各府、州、縣要來的青年，多半是當時的秀才，間有舉人貢生，都是所謂中學（指中國的學問）有根底的青年」（註八）因此儘管入學後受到西方新式教育的薰陶，他們對傳統文化始終有一份難以完全割捨的情懷。辛亥革命前後，山西大學堂畢業生遍佈全省各行政、民意、教育機構，所以革命期間的山西一直夾雜著一股溫和保守的情緒。

一九〇二年，山西武備學堂也再度復學，（註九）所收學生「多是各縣應試裡童生并有不少在庠生員」（註十）亦具相當舊學根底。後清政府陸續選派武備學堂資優生數十人，赴日學習軍事，因這些留學生大多係用省款，故學成返國後均回本省服務。當時「山西軍中的山西籍人不過十分之二」，經留日士官生閻錫山等人倡議行征兵制後，「新軍步兵兩標中十分之六以上的兵員即成為山西籍的勞動農工」。（註十二）至此山西軍權已逐漸掌握在一批具備相當舊學新知的山西省籍軍官手中。

綜合以上所論可知，清末的山西人士在大環境的限制下，大都留在本省發展，對省外環境難免漸生隔閡；在追求現代化方面，他們也傾向於不與舊傳統完全斷絕的保守心態。再以山西地理上與舊勢力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毗鄰，也很難完全不受來自北京的壓力和影響。就是這樣的歷史背景，決

定了辛亥革命後山西的走向，以及閻錫山的蹶起。

閻錫山不是個鋒芒畢露的人物，事實上在同盟會的同志中，他的聲望不及谷思慎；在軍事學素養上，他不如溫壽泉。惟在對傳統制度、人事的妥協，及山西本土性格的體現方面，他的表現無人能及。閻氏於一九〇九年從日本學成返國，旋被派為山西陸軍小學教官。後為掌握新軍，閻透過諮議局長梁善濟之關係，取得巡撫丁寶銓之信任，（註十二）獲任山西唯一混成協的標統（團長），為山西新軍中最高職位的本省籍人士。閻取得此一職位後，更得以大肆安插革命人士進入新軍，厚植實力，儼然已成各方交相推重的人物。

閻錫山之所以能在辛亥革命前夕，成功的周旋於清政府山西當局、諮議局的立憲派、和同盟會的革命同志之間，並深獲各方好感，除其精於應對權術外，其中和、妥協的個性亦為要因。閻氏生長於晉省東北五台縣的河邊村，該村民風相當保守，對傳統禮教極為尊重，「少有失禮，村人就會指責非議」，（註十三）因此養成閻氏對傳統文化的敬重之心。及其東渡日本學習軍事，發現中國的確已不如人，但仍堅信「中國物質科學不發達，不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是被君位傳子專制政體的政治力量所枷鎖」，（註十四）故日後閻氏所有的改革主張中，幾乎都仍有傳統的影子。閻氏這方面保守的態度，固然常為激進的革命份子所不滿，但卻使舊體制下的統治階層感到安全，也較能為一般山西人士所接受。

辛亥革命中對閻錫山輔佐最力，並成為閻終身摯友、政治伙伴的趙戴文，亦是一典型的山西保守